

香港中等教育裏的漢語教學

柳存仁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

我到香港來，和當地教育界及社會上對漢語教學有興趣的朋友們共同討論香港中等教育裏漢語教學的問題，這已經是第三次了。尤其是這一次，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後剛才不過一年多的時間，社會上各種情況，其實還在逐漸地變化之中，我們說「五十年不變」，當然指的不是語言和文字學習的需要和方式。譬如說，就是在今天的學校教育範圍之外，社會上要求學習普通話的人也愈來愈多起來了。這是一種自然的趨勢，促成這種趨勢和要求的因素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它絕不是發自少數人的，而主張努力學習普通話的人，也並不曾突然要排斥這裏六百多萬人習用的方言，因為方言的流行和活躍，也是自然的。所以簡單地說，我相信香港人還要繼續擴展能夠說普通話的空間、環境，在很快的時間之內普通話就能夠使用得和粵語並行不悖，向來只能說方言的人，現在也能夠南腔北調地慢慢地不以兼學另一種使用範圍更廣大的共同的語言為累贅了，而外省到香港來工作、觀光、甚至長住的人們，也會很高興地增添了一種能夠使用的，充滿了活動生氣的方言。

我第一次在香港參加這些有關漢語教學的討論，是一九七零年七月，也是由今天的主人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我記得我被邀講過的兩個專題，一個是〈工業社會的課程和教材〉，一個是〈國語乎？粵語乎？〉，這第二個講題，我並不曾鹵莽滅裂地要求大家停止用粵語教授漢語的學習，不過要求穩妥地漸進，擴大些學習普通話的機會，期望它在幾十年之內能夠讓專說方言的人也能夠完全明白和使用普通話，增多一種表達的工具罷了。我的主張不算激烈，是理性的，所以後來在分組討論會裏，聽說也還沒有什麼不好的批評。我的討論課程和教材的專題，特別主張中學會考要重視作文，平常在校內學習的過程中也該重視作文，這樣才能切實地培養學生們的思考和表達的能力。不料我的這一個觀察卻遭到其他的同道的批評了。後來在大學的報告書裏，「教學目標」這一個分組作總結的黃國芳先生說：

柳教授的兩篇演詞，對課程、教材、考試、家課的批評，皆極有見地。特別是他對於一九六八年中文科教學研究委員會的《報告書》及對各項會考課程的各點指責。惟本組對他關於默書和作文的意見，則不

甚苟同。¹

也許參加開會的老師們怕改作文，所以反映出這樣的意見。不過苟同一詞是比較厲害的用語，黃先生是老朋友，當時是香港政府的一間學校的校長，我事後也沒有去麻煩他。現在事過快三十年，黃校長的墓木已拱了。不過，我今天仍舊要主張注重學生的作文的。

第二次我在香港跟大家討論漢語教學的問題，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那一年我恰巧應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邀約，到所裏來住幾個月，講一些關於中國小說史的題目。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在九龍東區的扶輪會聚餐席上，發表了〈香港中文語文教育低落對工商界的影響〉的講詞。講的時間前後大約只有半小時，我的觀察和意見也很普通，即使不能說是老生常談；不料它卻發生了較多的影響。二十八日已經是年底了，一晃就是新年。下一年一月三日香港電台電視部的 Michael Henderson 先生和他的技術人員到大學來找我，要我再說一些上個月講演提到的一些問題，我約略答覆了他的許多問句。這段錄影，後來是見於電視的。大約在這個期間或是稍早一點，香港《明報》的社論裏也提供了一篇批評學生中文程度低落的文章。教育司署的何雅明先生來找我，說教育司陶健先生(Mr. K.W.J. Topley)想見見我，問我那一天有空？一月十八日我騰出了時間在教育司署和他晤面，在座一齊交換意見的還有視學官蘇輝祖先生，江李志豪女士，大家談了不到兩小時，最後陶健先生又請我們吃了一頓飯，是我這次講演物質上的收穫。這些小事說起來到今天也超過了二十年了！一個人到了年紀稍微大了幾歲，說話就往往使別人多厭。清代乾隆年間有一位曹庭棟，他七十多歲的時候就寫了一本很有意思的書，叫做《老老恒言》，表示他所講的，都不過是理性的話(rational words)，並不是無理取鬧，要和人為難的。我今天願意也借了他的這番意思，誠誠懇懇地說幾句話，藉答大學和香港各位教我來和大家見見面的盛情。

前些時候香港的中學會考的成績發表了，這是香港回歸中國主權之後第一次的中學會考。朋友們偶然寄給我一些報紙上面的批評文字看，認為是一般的中文水平低落，引為隱憂，這是大家可以了解的。不過，我看低落不低落，除了表面上的統計表格之外，也要看它的質素和影響面，也要看社會上要求的底線是什麼。譬如我們說中國大陸上一般中學生的漢語水平在六、七十年代「文革」時期是低極了，這是無可諱言的，因為誰都知道那個時候不但沒有考試，也幾乎沒有學校，沒有教育，幾乎有十年以上沒有水平可見。但是近二十多年大家緩過了一口氣來，漢語教育的情形就很不同了！一九九零年台灣的潘石禪教授(重規)到甘肅敦煌去參加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歸程時在火車上作舊詩寄

1 《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報告書》香港，中文大學，1970，頁68。

給我，說「不到西北，不知年青學人之懿」。懿，自然就是美的意思。²今年五月我到北京大學去講演，正式的講會之後還有到市區裏一家書店的閱覽室的公開座談會，聽了那些青年學生們發問的很中肯的問題和面對着熱鬧的氣氛，就很容易體會出來潘先生說的「年青學人之懿」是怎樣的情緒了。香港的青年同學中文水平比較地低落，原因自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不過積重難返，特別關切它的人，或是年紀長些有過多年來教書、閱卷的經驗的人，從個人的經驗上熱心地做出了比較，也許會覺得一年不似一年，於是也不免廢然興歎了——要說好像我當年教出來的學生，成績似乎還不是這樣的。這裏面自然不是一點理由也沒有，但是我們也不能用一部分的見解去取代那全部的客觀的檢查和表現。事實是：現代的教師們、校長們、學生們，自然不是幾十年前的教師、校長和學生，而現在大家的期望，雖然也還有一部分和過去的有良心、有正義感、講究公平、自律和努力研習自己的工作的教師們的要求息息相通，但是他們和大家相處的社會和環境，已經又和幾十年前的社會和環境完全不同了。如果我們要批評過去少數的漢語教師的不盡責任，不知上進的地方，那是過去社會的遺痕，應該對今天的教師們和行政管理人員們，沒有太大的關係。

過去的社會是一種苟安的社會。苟安的社會一切的努力，只求物質條件的豐裕，生活的舒服，個人財富的增加，這原來也都是一切人類活動的原動力，除了逸出法律之外，自然無可厚非。但是這種活動如果過分偏差，社會上一般人的見解又正像經濟學上說的值錢的東西受人注意，不值錢的東西拋棄一邊，那麼在過去香港的各種要求之下，學習漢語的社會需要和政治環境的條件配合，商業利益的盈虧，都比不上更時髦更有很快的兌現性的英語，就是不言而喻的了。不過做為點綴，和應付範圍較窄的實際要求，在過去的建制上並不曾把學習漢語的機會完全排除，不過它受不到太多的關懷和鼓勵就是了。社會既不重視，這種種不受重視的遭際到了極點，做為是一種專業，老師們自己看自己好像也自慚形穢，比不上那些收入好地位高的同事們，更不用說去比那些從遠方請來的外籍老師了。這樣的可憐的老師日子過得久了，精神和體力都會受到打擊，意志消沉，無精打采，就真正成了一位教書匠了。

需要既然不大，社會對漢語教師的要求也不急迫，也不嚴重，如果漢語學習的水平沒有很大的進步，我們其實怪香港不得。但是到了現在，從政治、經濟到教育、文化，許多關係的條件都在變化之中，或者可以說已經發生了許多積極的變動了。像中國大陸和台灣的社會過去這二十多年經過了多少的變遷，香港的教育界目前也面臨不少新的要求和新的改變了。例如社會上那樣支持學習普通話（大陸及香港從前和今天台灣稱它做

2 《說文》卷十下、壹部；《爾雅·釋詁》；《易經·小畜》；《詩經·大雅·烝民》解釋並同。

國語)。這在幾十年前就是不容易推動的，更不用說像現在的水到渠成了。偶讀胡適之先生的《日記》，民國二十四年(1935)一月八日他在香港，記云：

到胡女士 (Miss Kate Wu) 的聖保羅女校參觀，並談話。

扶輪社午餐，演說 How China Made Progress During These 20 Years?

巢坤霖先生約同羅仁柏先生(華文學校的視學)汽車遊九龍，詳談此間學校用國語的問題。羅君不甚贊同國語，故巢君邀他來與我遊談，要我勸導他。我們談的很好。³

巢先生那時候在香港政府的學校教書。他是早期的留英學生；曾在北京的清華學校(清華大學的前身)教過英語和拉丁文，所以跟胡先生認識。巢先生在中國工作過，知道普通話的價值。羅先生和胡先生雖然「談的很好」，也沒有被這位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名人進的「游詞」所感動，不然香港人也許六十多年前已經有機會能夠讓方言和國語競爽了！

我們今天的三個問題

今天香港的漢語教學面臨有三個可以令人關心的問題：一個是文言和白話的問題；一個是用方言來學習用普通話書寫的漢語書面語的問題；一個是英文中學和中文中學學習漢語分量輕重的問題。就我個人的觀察看來，第一個問題似乎比較更重要；第二個問題許多主張直接選用普通話教學的人們也許覺得更重要，可是我看這還不是最急迫的。第三個問題，恐怕是最不成問題的。

現在我們來試行把這些問題分析一下，先說文言和白話的問題。一般地說，白話就是一個時代或許多相沿承續的時代流行使用的口語，而文言，如果我們用學術界的術語來說，它就是古代漢語。古代漢語聽起來聲勢嚇人，一定是很艱深的，開始學習漢語書面語的人最好少碰他。中國人尚且如此，不用說外人了。但是實際的趨勢卻又不然。我們都知道十九世紀以來西方人像理雅各 (James Legge) 那樣的傳教士和翻譯家，他們學習漢語是從用文言寫的古書開始的，可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的時候，各國人(尤其是受軍事訓練的人)學習漢語，沒有不是從白話入手的。我們多數人以此況彼，一定都會說學習白話口語是比較容易的，文言文應該放在後面。可是，曾經翻譯出版過全部的《楚辭》和曹雪芹的前八十回《紅樓夢》的英國霍克思教授 (Prof. David Hawkes) 在一九六一年就任牛津大學的中文講座教授時的就職講演就說：

3 《胡適的日記》；第十二冊，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影印本，無頁碼。

我不信在我們國家的任何一位對中國研究關心的人，不管是在這裏，或在劍橋，或倫敦，會對有知識的、科學的研究現代中國的歷史、制度表示異議。那麼，讓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把事情弄清楚罷。這件事情和現代漢語口語在大學課程裏佔什麼地位是根本沒有關係的。任何一個研究現代中國的歷史，並且能夠處理中文資料的人（這些人是出奇的稀少），會告訴你他所有的各種原始資料，都是用古代漢語寫的。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之亂、同治時政權的恢復，⁴ 百日間的變法，⁵ 義和團事件和孫中山的事業，這些題目，單舉隨手拈來的一些，研究時如果是用原始資料，它們沒有不是用文言文寫的。我們常常有一種假定，因為我們需要現代研究，漢語口語是現代的，所以要想把現代研究做到最好，就得犧牲掉古代漢語的研究。這種假定是根本謬誤的。

I doubt whether anyone in this country who is concerned with Chinese studies, whether here or at Cambridge or in London, would dispute the need for the informed,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history and institutions of Modern China. Let it be clear from the outset, then, that this has absolutely nothing to do with the position of Colloquial Chinese in university curricula. Any student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who is capable of handling Chinese sources (there are remarkably few) will tell you that many of his primary sources are in Classical Chinese. The Opium Wars, the Taiping Rebellion,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the Hundred Days' Reform, the Boxer Rising, the career of Sun Yat-sen---these subjects, to name only the first few that come to mind, would be studied, as far as primary sources are concerned, exclusively in the Classical language. It is entirely erroneous to assume, as is often done, that because we need Modern Studies and Colloquial Chinese is modern, therefore Modern Studies can best be advanced by promoting Colloquial at the expense of Classical Chinese.⁶

對於西方的學人們說，霍克思教授的話可以說一針見血。但是他還不曾強調說明文言的古典漢語雖然不是今天的口語，它也曾經做過古代某個空間、時間的口語，因為語

4 原文T'ung-chih Restoration 實指清咸豐十一年(1861)冬天慈禧太后等人從熱河返北京，奪取政權的事件，次年即同治元年。

5 即戊戌政變。

6 Chinese: Classical, Modern and Humane,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25 May 1961 by David Hawkes, Oxford, 1961, p.24. Included also in David Hawkes, Classical Modern and Humane, Essays i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89, pp.20-21.

句比較雅馴，它的表現方法被後一個乃至多少個時代的人保存下來了。管它叫做古文，其實還有些詞不達意。我們要是更質直地說，今天大家心理上所指的文言，其實就是較好的、經過修飾了可以流傳下來的白話。唐朝時候的科舉考試，最吃香的是進士科。進士的考試，雖然也包括一種所謂時務策，但是有一個很長的時期，試詩、賦佔主要的地位。可是唐朝又有一種投卷的制度，沒有受試的士人可以把他們的文字謄了下來送給顯達的人請他們向試官推薦。這種投卷的文字，除了詩賦，也常有他們自己創作的「傳奇」，主要地是用的散文體。這種散文，就是韓愈等人所說的古文，是一種比較容易明白的文字。⁷

我們今天常說的那種古代的白話文字，其實是一種特別的白話，就不全像文言文那麼好讀。北京大學的吳小如先生幾年前曾著〈「文言文」與「白話文」〉一篇短文章，說「在我國各類著作中，有三部分最難懂，即《尚書》、敦煌卷子和唐宋以來小說戲曲。」⁸ 他這話是很不錯的。《尚書》裏面不少難讀的口語，韓愈的〈進學解〉一篇已經用「佶屈聱牙」去形容它，⁹ 《史記》裏面〈股本紀〉、〈周本紀〉用到《尚書》的文字，也常有改寫成漢代一般人比較容易看得懂的文言，這種文言文，從西漢一直傳誦下來直到清末，實際上只要我們讀過像《論語》、《孟子》、《左傳》、《史記》、《漢書》……這一類基本的古書驪偶文字不多，而且只在特殊的地方出現的語文，是不難貫串明瞭其他性質相同的著作的。至於那些特別的白話寫的文字，吳教授說是不容易懂，我想他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們一點兒都看不明白——實際上我們稍通文字的人大體上也看得懂若干部分的《三國演義》、《西遊記》……，但是那些純粹代表一個時代一個地區的語言的地方，我們要是不去檢索那些專門做過研究的學者們發表的個別的論文或彙集資料還不算考證得十分詳細的辭典，恐怕就有許多地方，只能囫圇吞棗式的，勉強受用，食而不化了。我喜歡看小說，也常看小說，這裏姑且從小說和俗語裏，各舉一兩個例：現在大家說的廣東語話裏，似乎還有「冇撻撒」一語，這句俗語，來源是很古的，不過從前寫這個詞不用廣東俗字「冇」，卻寫做「沒撻撒」或同音相近的詞罷了。這個詞，明代的小說《西遊記》、《金瓶梅》都可以找到，¹⁰ 印證了今天的廣東話，就知道這個詞語在我們許多人的語言裏還是活着的。「小的」一詞我們現在口頭上大概不大用的，可是明清小說遲到《忠烈俠義傳》一類的著作裏還很常見。它也是古代實際生活裏用的名詞。五代十國的時候各地紛亂，軍人驟起爭權

7 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3-29；66-78；陳寅恪《讀《鶯鶯傳》》；〈元微之悼亡詩及豔詩箋證〉，《陳寅恪先生論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1，頁394-400；444-461。

8 吳小如《讀書拊掌錄》，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頁250。這篇文字原作於1993年。

9 〈進學解〉，《韓昌黎集》卷十二。

10 試檢《金瓶梅》第57回「沒搭煞」，《西遊記》第39、56回「沒搭撒」；《三寶太監西洋記》第11回「沒踏蹶」。看何心《小說詞語匯釋》，北京，中華書局，1964，頁273-74。

奪利，各不統屬，部屬裏有一些為軍官服務的人就叫做「小底」，「小廝」、「小的」這些新詞都從此而出。我們如果讀一下《舊五代史》、《宋史》……記敘這個時期的事情的書，就知道「小底」還是很正式的職銜，《宋史》裏面宮庭中的小底還是有等級的。我現在又想到一句廣東俗話，說亂七八糟胡搞一氣叫做「胡裏馬叉」，這句「胡裏馬叉」我還不曾找到它的出處。不過，我知道日本有一部時代頗早的小說字典，書名叫做「怯里馬赤」，編輯的人據說是陶山南濤。南濤是日本儒家學者伊藤仁齋(1627-1705)的弟子，已是中國歷史上清初的人。陶山南濤曾著《忠義水滸傳解》，可是怯里馬赤一詞大約仍是元代蒙古語的遺留。¹¹我舉這些例子，是想證明小如教授的說法，有些白話恐怕比文言難讀。在中學的歷史教科書裏，唐代以來禪宗語錄用的語句，也是很費師生們索解的。因為它們裏面，也有許多不易明白的白話。¹²

從上文看來，白話、文言其實只有一個語言系統，卻不易分清誰是文、誰是白。白話的語法，其實是跟文言文的語法很接近的，就是各地方言，它們之間也有一種自然的聯繫。我們看：

(1)君以此為何如？(2)君謂此何如耶？(3)君謂此善不善耶？

這裏第三個例，「善」和「不善」並舉，是中國語文裏很早的一個形式。例如《墨子·墨經》經上下闌、經說上後半「諾不一利用」條云「長短，前後，輕重援」，《孟子·梁惠王上》「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都是相反的形容詞對舉的。「善」或「不善」是它們在現代的翻版，在普通話裏的「好不好」，就是漢語裏這種句法「放諸天下而俱準」的一個類型：

- (4)你睇咁樣好嘸好啊？(粵語)
 (5)你看這樣好不好呀？(普通話：河北、山東、河南……)
 (6)你看這個樣子好不好？(長江上游……)
 (7)儂看啲個樣子好弗好？(長江下游……)
 (8)儂看箇個樣子好弗好？(長江下游……)

我們下面再舉一個明代小說裏的例證，看看為什麼白話和文言會很明顯也很自然地混沒了人為的界限。這例是從《三國志演義》第一零五回錄出來的。諸葛亮死了，向來有野心的魏延不服楊儀的調度，領兵造反，馬岱跟隨他，耀武揚威，引兵直取南鄭，已經

11 影印本的《怯里馬赤》，收在古典研究會編輯，《唐話辭書類集》，第一集，東京，汲古書店，頁565-744。

12 看高名凱〈唐代禪家語錄所見的語法成分〉，原刊《燕京學報》，第34期，收《漢語語法論集》，香港，崇文書店；1971，頁141-176。

來到城下。楊儀在門旗影裏看了諸葛亮留下的錦囊，胸有成竹，就輕騎而出：

立馬陣前，手指魏延而笑曰：「丞相在日，知汝久後必反，教我提備，今果應其言。汝敢在馬上連叫三聲，‘誰敢殺我？’便是真大丈夫。吾就獻漢中城池與汝。延大笑曰：「楊儀匹夫聽著：若孔明在日，吾尚懼三分。他今已亡，天下誰敢敵我？休道連叫三聲，便叫三萬聲，亦有何難？」遂投刀按轡，於馬上大叫曰：「誰敢殺我？」一聲未畢，腦後一人厲聲而應回：「吾敢殺汝！」手起刀落，斬魏延於馬下。眾將駭然，斬魏延者乃馬岱也。

這裏的句子「吾」「我」的關係，「他」和「汝」的用法，在文法上都是很饒趣味的。但是愛看小說的讀者仍未必要研究這些，他們甚至也不一定要判斷它是白話或文言，其實文言和白話的益處他都沾溉了不少了。五四時代好的白話散文，如果舉那些很有深度的文字，沒有一篇、沒有一位作家在修養上不流露了文白不易分清的境界的。

關於粵語的問題

我們剛才把白話和文言都放在同一個系統裏，粵語既是方言，當然會有不少白話的成分，這白話兩個字如果我們特別強調它，就可以歸到我剛才所舉的所謂特別的白話之列。這種特別的白話，如果是沒有經過學習的過程的人 (the uninitiated)，是聽不懂的。但是粵語，包括今天香港一般使用的粵語，它實際也有古代漢語的影子。我這話指的不是十九世紀中葉迄今在香港用的口語裏留存的一些過去的痕跡，例如：

一文(一圓) 銀(錢、如「幾多銀？」即「多少錢？」) 銀紙(鈔票)
毫子(毛錢) 出糧(發工資) 書友(同學) 番鹹(肥皂)

這些詞或短句雖然在古代漢語的使用裏或者也偶然會見到，它們究竟和我們距離還不太遠。我要說的不是這些，卻像從前我寫的〈國語乎？粵語乎？〉的文章裏說的，如果一位只能說普通話或外省話的人到了香港，住下兩三個月之後，他會說：

我想指出粵語在中國語言裏是一種特別生發有力的語言。日常口語裏所用的許多形容詞，例如「論盡」、「標青」、「沙塵」、「閉翳」、「滋油」、「甩鬚」；形容詞或副詞例如「是但」，副詞例如「直情」、「零舍」，雖然並不是不能把它們譯成國語或另外一種方言的，但是譯了之後，常令人感覺到不能夠那麼銖兩相稱，同樣的情形，例如「叻女」之「叻」，也許可以譯做「了不起」，「精女」之「精」，也許可以譯做「聰明伶俐」，「衰女」之「衰」，也許可以譯做「倒霉」，但是譯了之後，你依然會認為它有餘意未盡，非經

常使用這一種語言的人，不容易體會它的微妙。又如「歎世界」、「撈世界」、「挨世界」，這裏三個動詞這樣用法，也是粵語的特色。從表面上看來，「歎」似乎是享受，「撈」似乎是「混」，「挨」似乎是吃苦，但「歎」字在這裏的用法不止於享受，還有慢慢地享受不盡之義；「撈」字不止是混，在混之中還有它的實質的目的，「挨」也不一定是忍苦，忍之中還有歐陽修（《瀧岡阡表》）所謂「蓋有待也」的意思。這些地方，都見廣東話的生動和深刻。

他還會同意我說：

今天的粵語裏還保持了不少中古時期古代的語言和或者更古的語法，這都是現代研究中國語言聲韻的人特別珍貴的。今天只能說國語的人不懂得入聲字。廣州話不僅平、上、去三聲各分陰陽、入聲更分陰入、中入和陽入，¹³ 是今天還保存九聲的一種方言。在這種方言的說話裏，走叫做「行」，脖子叫做「頸」，翅膀叫做「翼」，吃叫做「食」，喝叫做「飲」，穿叫做「著」，臉叫做「面」，說叫做「話」，把叫做「將」，上下叫做「上落」，下雨叫做「落雨」，終於叫做「卒之」……¹⁴

這樣引證下去，看叫做「睇」，美妙叫做「靚」，越說越多，各位一定都還有不少的詞可以加上去的。睇和靚是外省人不大習用的動詞和形容詞。睇字是很古的字，原義本來是斜眼看人，所以《禮記》裏認為是不恭敬的神情，不許子女對父母、媳婦對翁姑這樣。¹⁵《說文》卷四上說這是「南楚」的用法。廣東在嶺南，或者很早就有這個字流傳了。廣東話生氣時說「我有眼睇渠」，表示連斜眼都不想看，正得這個用法的真傳。靚字在字書裏本來讀 jing，《說文》卷八下「疾正切」，這字入見部，意思是召見，青旁是讀音。《詩經·邶風·靜女》的「靜」字毛《傳》裏並沒有美貌的解釋，但是詩句「靜女其姝」、「靜女其變」，整句說的都是美女，所以「靜」一定也有美的意思。因讀音的關係，靜和靚字就成了同義字了。《後漢書·南匈奴傳》描寫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這裏靚字除了當美字講沒有別的解說可通的。那麼，廣東話裏這樣的用法已經可以追尋到南北朝以前的時候了。外省人初到香港，看見攞搵兩個字不認識，以為是兩個怪字。這個相當於垃圾的詞，宋代《廣韻》入聲字二十八盍部早就有了，解釋是「破壞」，引申就成了不再需要

13 《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報告書》，前引，頁55，這裏原文做「入聲更分上下陰入和陽入」。

14 同上注。

15 《禮記·內則》：「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噉噉咳欠伸跛倚睇視。」

16 這是東晉孝武帝太元末（約396）京口（今江蘇鎮江）的民歌。

的東西。《晉書》卷二十八〈五行志·中〉有個民謠，說「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栖。」¹⁶字的寫法不同，那比北宋更早了！

普通話在語音上是以北京話為標準音，但是它又以北方話做基礎方言，所以它也吸收了其他方言的成分。《漢語拼音方案》的普遍採用，自然也加速了普通話的推廣和語法的規範化，使它成為一個統一的中華民族的共同語言。從前我們有一個時期稱它做國語，當然這和《二十四史》裏面的《遼史·國語解》或清朝滿洲人稱滿文做國語、國書狹義地限於一個民族的語文的意義不一樣，卻和另外一個舊名稱官話倒還相當。官話，自然是一種人造的語言，當初它是為了行政的方便，逐漸造成的一種官場上的、規範不很清楚的共同語，為了方便東南西北各地操着不同的方言的人進入仕途之後怎樣能夠互相了解，不致誤會。它的創造和使用，自然有一定的政治需要。廣東一省的方音也分幾個區，除了廣州話，還有潮汕、客家這些系統，雖然無疑地廣州話在影響上比較要佔優勢，這裏面恐怕也和官話一樣，廣州是一省的政治、商業和文化中心就不無關係。就中政治的因素自然很大。漢文帝時候南粵王趙佗的情形我們其實不很清楚，但是五代十國時候的南漢，我們讀了《舊五代史》的〈南漢世家〉，廣東的繁盛和寶貨的蘊藏之富已可想像，更不用說十九世紀海禁大開的廣州了。廣州話成為一省的官話，甚至今日影響到世界各地，是具備客觀的條件的。

廣州話雖然在省內和香港地方流行，它的勢力也影響到海外各地的移民和他們的後裔，但是它其實沒有用粵語寫的文學作品，像清光緒間松江韓子雲用吳語寫的小說《海上花列傳》那樣。我看過一部清咸豐十一年（1861）廣東刻的署名攬西梁朗川著的《繡像瓦崗寨演義傳》，裏面有零碎的廣東俗體字和一些廣東口語的表達方法。廣東的風調並不很重。但是即使像《海上花列傳》寫的那麼流暢，魯迅說它「平淡而近自然」的作品，也不能流傳甚久或甚廣，今天還需要人替它重譯做普通話，而翻譯的人雖然對兩種語言的體驗能力都很高，可是使用的文字脫離了那個特定的語言環境，恐怕就不能傳神。不但是小說，就是粵語俗體的詩歌像清道光間招子庸著名的《粵謳》，¹⁷近年廖鳳書先生（恩燾）印的《嬉笑集》¹⁸，恐怕有許多地方外省人或隔了時代的人閱讀，都需要一些注解了。

香港的環境客觀地說是經過一百五十多年失落後重新回到中國的土地，但是它是特

17 《粵謳》最早的版本大約是清道光八年（1828）的刊本，其餘的本子仍有數種，參看黃蔭普《廣東文獻書目知見錄》改訂本，黃氏憶江南錄叢刊之五，香港，1978，頁249。

18 廖先生在民國十三年（1924）出版過《新粵謳解心》，三卷，它的寫作可能曾受到招子庸的影響。這書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和鄭西諦先生（振鐸）都有藏本，鄭藏作珠海夢餘生撰。《嬉笑集》1949年印本有作者自序，1970年有重鈔的影印本，那時廖先生已故世十六年。參看羅傑烈先生《詩詞曲論文集》，香港三聯書店，廣東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1982，頁131-148。

區，因為它又是世界上最熱鬧最緊張的國際大都會之一，每天它的金融上落的恒生指數，是中國到現在為止唯一的一個出現在世界上各種訊息傳布的指數。這是香港人共同努力的成就。在這樣的紛繁、忙迫，急管繁絃的大社會裏，它仍舊有嚴肅的教育和文化事業，也有輕鬆的都市流動性的風貌，是世界各地的人觀察香港，了解香港的共識。我們今天去看紐約，看巴黎，也會看到聽到許多也許可以描寫做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但是那自然不是所有的紐約客，或巴黎人。說到用俗語、俏皮話，slangs，今天我們還可以買到研究它們的外語辭典，它們和古典文學的辭典一樣的煌然陳列在大書店的書架上。但是slangs式的口語，在許多正式的甚至交際性的談話，是不能用的，學校的課本、公牘、團體的文件更不用說。

實際上今天香港各報紙的新聞、社論，還是用普通話紀錄的。副刊和廣告上的粵語成分，只可以說是本地風光，出奇制勝的手段，就是外省人的作家，在香港住得久了，寫出來的句子也偶然會有用粵語語法的地方，雖然在那些作品更多的篇幅裏，中國文字的傳統的特點仍舊是很明顯的。香港的副刊和刊物裏有輕度的slangs，這是它活躍的現象。自然，這裏面也會有一個自然的底線，這個底線會由社會、作家和讀者們決定。《禮記》記孔子說：「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¹⁹ 中文大學何文匯教授近年和香港電台電視部合作的粵語正音的錄像片子，大概可以說是在這一方面教育界和傳媒界的心聲。

用粵語讀文言文和白話文

今天香港中等教育的漢語教學，學習的方法簡單地說是用粵語唸文言文，也用粵語讀語體文，這是許多年來都這樣繼續着做的。香港並沒有人用粵語寫教科書，也沒有人有過這樣的企圖。

這樣的讀漢語、漢文的方法，其實不是香港人或廣東人特創的。在全國各地推廣普通話的號召之下，用普通話教書，當然名正言順，但是用本地方言的，恐怕也不是絕無僅有。南方各省的老師說的普通話不那麼道地的，甚至鄉音無改的，實際上他們的語言學生們大體上能夠明白，習慣了之後也不會對老師那麼挑剔，因為學生們離開了課室還有其他的機會聽到別的人說普通話，或者在課室裏聽到普通話說得好的別的老師說的普通話，總之，如果普通話再也不是異端，一種對學生的未來有利益的共同語言就能夠萌芽了。大學是全國性的，有的大學甚至是國際性的，但是在大學講書的老師，特別是老一輩的南方學者，不能夠說以北方話做基礎方言的國語，是很顯然的了。我六十年前在

19 《禮記·雜記下》孔子告訴他的弟子子貢的話，子貢看見年終舉行的蜡祭，老百姓們舉國若狂的情況不明白，就對孔子說我不知道他們在搞些什麼。

北京大學聽錢賓四先生(穆)講書，說的是他以為那樣就很接近北方話的無錫話，可是聽他講課的北方的同學(陝西、甘肅、山西、蒙古來的都有)沒有一個人鼓譟的，是因為錢先生說話的時候有精神，善於說理，大家聽了能夠明白，也能夠增加新的知識和見識。錢先生五十年代在香港講學，語言也還沒有改變，說廣東話的同學聽過他幾次，聽說也漸漸習慣。所以我想我們的中學生即使仍舊用粵語讀文言文或白話文，如果能夠了解和熟悉了漢語書面語的文字結構，除了嘴裏說的普通話可能不那麼好聽之外，在文字的知識上是不算怎樣欠缺的。現在各種課本裏，都有不少的語法的說明或分析，有的地方似乎用的專門名詞多了些。其實有些抽象的名詞，語法學者們的說法並不是很統一的，同學們要是太用功的，也許有的人會專找這些術語來記憶，就會有小題大作的地方。死記若干語法上的名詞是不可取的。一般地說，學生們汎讀的東西多比死背書強，而可讀的材料實際上又一定不止於每天需用的那個課本。我有一個含渾的印象好像現在的課本各種的知識太詳細了，覺得頗有點拘束了一位教師的活動。好的教師如果真的活動起來，課本上一部分的指示已經可以讓他做好半天的。至於學生，閱讀大量的課外書籍也許比精專的只顧一冊課本的要強。《儒林外史》第一回描寫窮出身的王冕沒有錢繼續讀書，只得替人家放牛。他攢了點心錢，「立到村學堂裏，見那闖學堂的書客，就買幾本舊書，逐日把牛拴了，坐在柳陰樹下看。彈指又過了三四年，王冕看書心下也着實明白了。」我鈔了這幾句，覺得我們真應該給學生們一個「心下也着實明白」的機會。

中文大學的朋友們近年很注意用粵語讀詩、詞的方便和好處，因為漢語的聲調也是辭彙部分，而且每個字都有一個元音(vowel)。雙聲、疊韻這一類的認識，也增加了中國語文的美感。現在的中學課本裏，詩、詞是有一些的，駢文、辭賦就絕少了。其實像司馬相如、揚雄那些長篇的賦，雖然史傳家也鄭重地鈔錄了它們，普通就是在大學裏專門研究文學的人，也未必人人要摸索它的。但是如果當它做文化和社會史科，就是高班次的中學生看一看它的樣子，也可以想像漢代中國國勢之強、山川之美，對於有心研究人文，或想多知道些過去的來歷的人是會有些啟發的。那一句句四個同偏旁的字，旨在列舉，正像現代用電腦的人如果把IBM, APPLE, DELL.....開張單子，形式也很相似，只是意識裏的印象不一樣罷了。至於那些更可入選的六朝小賦，或抒情，或寫景，其實骨子裏也和現代許多人還讀過的俞平伯、朱自清這些人的作品在興趣上差不多。因為文言和白話的作品，並不是隔絕得那麼懸殊的。

剛才我提到二十多年前香港舉行的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有些老師不贊成我批評默書的問題。我的批評的議論不妨在這裏稍提一下。我是不很喜歡教學生默書的，但是如果必須要默寫，我就要反對漢語默書要學的英語的dictation那種默法，就是隨便找一段受試的人未曾見過的文字，由主試的人逐字逐句讀出來，教受試的人默寫。英語是標音的文字，拼法可以從聽讀音湊起來，所以這個辦法可行。漢語重在形、音、義三方面，又

因單音詞佔優勢的關係，同音的字很多，這個dictating的辦法，就絕不可行。有一年小學六年級會試，默書就用的這個西式默書的辦法，要默改寫的《左傳》文字一段，口述的句子開首是「齊師伐魯，魯莊公將戰……」，默書第二句有寫做「腦空空裝箭」的。我想這樣的默書，如果得了零分，是冤枉的。

課本、考試和師資

我不能隨便批評老師的資歷和能力，因為這當然是有很多不同的情況的，但是我也許可以說老師需要做什麼，或者說學生本身、社會和學校應該向老師要求什麼，那是老師的能力可以做得到的，也是他們的責任之內應該做得到的。但是我現在最好先說課本，和學生們要經歷的公開考試。

考試，特別是中學階段到了學業結束告一段落的時候舉行的公開考試，是向社會負責的。社會上若是噴有煩言，譬如說中學生們漢語學習的水準低落了，我們也可以反問社會一下，你們要求的中學畢業生，假定他們是要進入大學的，在進入大學以前，或者他們不進大學，是打算在社會上先找個職位磨練的，在就業以前；你們的要求是什麼？我想，在漢語學習的範圍之內，他們多數向學生要求的，並且以為這是最低限度的希望的，不過是文字通順這四個字的總批評罷了！這個要求雖然不高，可是我看，也不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文字通順，就是學生要有高水平的寫作能力。這裏面又得包括三方面：就是(一)達情表意；(二)說理；(三)應用。

達情表意，指的自然是敘述的方面，主觀的可以說明自己的觀察和想法，客觀的就是要跟別人溝通，要別人明瞭我們，也要我們了解別人。說理，就是寫出來的文字有條理，有頭緒、步驟，合乎邏輯的分析。前些時候有朋友從香港寄給我一段岑逸飛先生寫的短文，是在今年中學會考放榜之後寫的²¹，文裏提到我許多年前上課的時候說過做幾何練習的題目對寫文章有用處，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做分析性推理性的思考。我很感謝岑先生有那麼好的記憶力，如果寫辯論性、批評性的文章，我想除了直接嘗試邏輯性的思考之外，平常做幾何題一步步的求證，看好的偵探小說的推理，對我們也是有用的。應用是你的寫作可以推廣到敘述或分析許多新的經歷，沒有不易表達的困難。

我們今天的課本，如果要應付這樣的要求，恐怕是無能為役的，因為它們的內容材

20 原文見《左傳》莊公十年。

21 似乎是今年八月八日的香港《信報》。

料太零碎了。如果用它們來考試會考的同學，那樣零碎的材料，學生們東記一點，西抄一段，獲得的只是記誦之學。不論是背誦、默習課本上的答案，或念熟了老師寫了出來的錦囊秘計，答案都一定會有「千人一面」的危險。這樣的作答，批分的人大概不會給學生不及格，卻是不容易證明學生有沒有或有多少真正的能力的。我想關於課本上面的一些文學的或文化常識性質的問題，在平常校內小考的時候做做，打打分數就行了，這些可以算是校內成績，卻不用在公開考試的場合再去測驗它。何況那些像是販來的知識，沒有細心研究過作品的人居然能知道，多數都是死記的。要是我們只讀過兩三首蘇東坡的詩，卻要熟悉他一生有什麼坎坷的經歷，那一年在什麼地方做什麼官，認識什麼朋友？實在是一種罪過。

公開考試如果最重要的漢語試卷只考一篇三小時寫作的作文，其餘的一兩個試卷只是輔導的，我想是可以鼓勵學生們，教師們多讀書，多進修的。學生們要想漢語學習進步，我看只有汎覽，只有讓他多塗抹，寫些又長又臭的不通的文字，而教師最大的努力以至愉快，就是要細心地把它們改得通順，可觀。這樣的要求，就是學生練習作文的次數一定要增多，教師們的改卷一定要細膩有致，不能用符號式的勾劃代替文字。中國大陸上曾經開過會，有學者主張教師改文章要改得好，最好同時自己也能試作一篇。他們特別指的是文言文。這並不是不合理的要求。

學生經過好幾個老師、好幾年這樣的訓練之後，他自己可以想問題，可以發揮自己的見解，可以跟別人辯論，可以自己搜求證據，尋找事實。他又汎覽書本，融會貫通，他的文字就會逐漸通順，自然，或者自己可以獨創一格。這樣的學生出來，是會記得自己的老師，是會對他她加倍地感謝的。這樣的老師學校當局應該考慮加他的工資。但學生文字好也不能幫助他入社會服務之後在他的專業範圍內立刻利用他的文字，但是他的思考能力可以使他在較小的範圍內一個一個地分析出每個問題的重心，因而很快地可以了解問題在那裏，並且應該怎樣去克服它或適應它。譬如商業性的寫信，草擬什麼計畫書，編輯一個刊物，這些東西都不是沒有一個可以學習的模式，文字技巧好和有見識的學生見了應該使用的模式很快地就能夠把握到它的主要點和應用。這正可以比喻像英文好的人也許能夠把他的普通文字寫得流暢，通順，像一般說的Queen's English那樣，但是他仍不能立刻寫得出好的公務員的英文，不過他能夠在很短的時間明白他可以照那個樣子揣摩公務員的英文。

現在各校用的課本在形式上是不統一的，其實是統一的，因為主要的課文只是一種。我看課本最好不要統一。我可以舉一個比喻，就拿古代漢語來說罷；清朝初年做大官的徐乾學——就是顧亭林（炎武）的外甥——曾經編注過一部《古文淵鑿》，裏面每一篇的古文都是康熙皇帝選的，可是這個選本後來並不怎樣流行。乾隆間桐城派的文學家姚

蒲又選了一套《古文辭類纂》，這書倒還時常有人談到，不過民間最流行的，還是吳調侯·吳楚材編的《古文觀止》，²² 這書在今年我也還看見有人為它寫文章。如果公開考試只考學生的作文，或者加重作文在計算成績裏的比重，讓學生們的腦可以精確地思考，讓學生們的筆可以流暢地發揮，文字通順的目的就容易達到些了。學校的老師們自己選題材，一個學校裏教漢語的老師們能夠自由地發揮他們個別的和集體的潛力，他們就會有更大的參與的興趣，學校和學校之間也能夠多些合理的競爭。這些活動自然並不出法律的範圍。如果老師們長期地這樣盡力，社會上對我們的漢語教學的看法，也會「刮目相待」。

香港的學制過去有英文中學和中文中學的問題，現在這一個關隘打通了，會考只有一個，在漢語教學方面就沒有什麼軒輊。實際上說，在過去英文書院裏漢語學習的成分還不算太輕，在中國大陸和台灣一般的中學校也有英語偏重些的，那些都是希望自己的畢業生多些人能夠考上著名的大學的個別的措施。這自然是另外的一個問題。單說漢語，和我們關係更加重要的，是怎樣促進同學們多學普通話的問題。

學漢語用普通話的問題

較早的時候的措施不講了，就是在第二次大戰以後，香港教育裏用普通話教學的問題，還是處置得很稀鬆的，幾乎可以說等於沒有注意。除了有少數方便外省來的不能說廣東話的學生，批准為他們設立用國語（普通話）做教學的媒介的中學校之外，學校裏教普通話的鐘點是很少的，每週恐怕只有一點鐘，現在也許加了一點（譬如兩點鐘），會考的時候分數的比例也不重，似乎只做半科。一曝十寒，那是無濟於事的。《孟子》裏面描寫南方的人教他們的子弟學北方人的語言，為什麼失敗呢？它的描寫極為傳神：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
 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²³

莊、嶽照東漢趙岐的注解，是齊國熱鬧的街巷，人多的地方。這一段話的寓意就是說要學什麼語言就要混在要學習的地方人堆裏去學，這就是後世所謂留學的辦法。五十

22 恩詠春（華）先生編《八旗藝文綱目》，卷二〈史部〉收了吳乘權的《綱鑑易知錄》，也是很流行的書。乘權就是吳楚材。楚材原籍會稽，後徙鐵嶺（遼寧），遂隸正紅旗。恩詠春先生是蒙族人，這書署蒙古巴嚕特·恩華，書是自印本，〈例言〉云成於乙亥（民國二十四年，1935），但出版仍在其後數年。

23 《孟子·滕文公下》。

年代以來外省人的孩子到香港，並沒有像從前英國來的cadet officers 進港大的語言學校，只要他們往用廣東話教書的小學一送，幾個月粵語就琅琅上口了，廣東話說得比他們的爸爸媽媽強得多。這也就是近年海外的許多洋大學把它們三年或四年中的某一個年級專修中文的學生送到北京去唸一年書，讀完後回來仍拿本校的學位文憑的理由。可是這個做法，香港的中學生是辦不到的，因為中學不是專學語文一科的，不能為了它就誤別的學業，而且課程也未必能銜接。北京既不能去，如果我們都認為普通話是需要的，就應該請說普通話的人來。香港《一九六八年中文科教學研究委員會報告書》曾說「教學語言應用國語」，但是跟着又說「惟在目前能操國語的教師尚未足用時，教學可以用粵語。」這樣一拖，晃眼又是三十年了！

我們現在講用普通話教書，我指的是用普通話教漢語學習的全部功課，不是教普通話。像主要地是為外國學生習漢語用的《基礎漢語》那樣的課本，像「Shangwu ni you ke ma?」（上午你有課嗎？）或「Kāixué liǎo! kāixué liǎo!」（開學了！開學了！）那樣的課文，不是我們這裏的中學生最需要的。我的提議是香港學習五年或五年以上的中學生，他們的中文（漢語教學包括中國史、地）的功課，應該規定要有兩年的時間全部是用普通話教的。這兩年最合理的，應該安排在第四、第五年，因為第五年完畢之後許多參加會考的人可能就要離校了。會考如果注重作文，學生普通話說得不好，也不妨礙他會考獲得很高的分數。兩年之中，耳之所聞，目之所觸，有了在那麼許多的鐘點裏收集到的資料，至少學生們不再會覺得自己是不能聽得懂普通話的一群了。在這兩年的時間他所獲得的語文知識，是一個中國人應有的語文知識。這知識也許不過是最起碼的，然而已足夠令他自覺到自己有了能夠和別人真正交換知識，交換意見的工具了！他不再僅僅覺得他是一個香港人了，他覺得他是一個香港人，也是一個中國人。

擔任教授這樣的漢語課程的老師，自然可以在本地聘任，也可以向中國大陸或台灣去聘。要求的條件是他們要有最適合教授高中或高中以上漢語的資歷，他們要能說正確明瞭的普通話，他們要有高度的責任感，更要有一種不怕困難的奉獻者的精神。他們用心講書，指導學生，不會忘記教師自修的重要。他們改作文，要像唐朝著名的大醫生孫思邈警告學醫的人說的：

其有患瘡痍、下痢、臭穢不可瞻視，人所患見者，但發慚愧、悽憐、憂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念也。²⁴

這樣的老師，包括現在香港已經有的具有同樣的熱誠、抱負和資望的老師，一定能夠為發展中的漢語教學開風氣。

一九九八年九月，寫於坎培拉之和風堂。

24 孫思邈《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卷一，〈論大醫習業第一〉，《道藏》800，頁3a-b。